



名人生活从
文

王千
主编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清洁的精神 文化名家谈历史

黄仁宇等／著
陈武／选编

广陵书社



人生活丛
名与文

王千
主编

清洁的精神 文化名家谈历史

黄仁宇等一著 陈武一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洁的精神 : 文化名家谈历史 / 黄仁宇等著 ; 陈武选编.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7.8

(名人与生活文丛 / 王干主编)

ISBN 978-7-5554-0843-7

I. ①清… II. ①黄… ②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现代③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I266②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0806号

书 名 清洁的精神: 文化名家谈历史

著 者 黄仁宇等著 陈武选编

责任编辑 金 晶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843-7

定 价 39.80 元

前言

原始社会，人类通过结绳和口传等方法记录历史事件，例如上古传说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

周朝后，开始有独立职能的史官，专门记录历史事件。《尚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史书。从西周共和元年（前 841）起，中国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史记》的规模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之后东汉时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组成了“二十四史”，对应了各个朝代（从秦统一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最后清朝结束）。除断代史之

外，唐宋间出现了通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是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体通史，是一部传奇的史书。

正史虽然可靠性强，一般主观看法较少，但是正史为了简洁可靠，许多细节都未予记载。不过还好，我们有稗官野史。比如《唐语林》《古今笑》《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等，都会让我们看到正史中记载不到的那些枝蔓，那些大事记录背后的事情。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极其精彩的，那么一个朝代呢？一个民族呢？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的阴谋诡计，机关算尽，爱恨情仇，金戈铁马，有多少故事，有多少血泪，有多少恢弘壮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中蕴含的精彩和经验，实在是过于丰富。本书精选近现代文学大家 22 篇文章，为读者朋友展示他们眼中的历史。



文景之治	黄仁宇	001
隋炀帝	黄仁宇	006
读韩愈	梁 衡	014
漫谈皇帝	季羨林	022
匹夫董卓	李国文	025
诗人曹操（节选）	李国文	032
谢宣城之死	李国文	042
唐朝的不死药	李国文	055
张居正始末	李国文	072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李国文	088
今日贺兰山	杨闻宇	104

静影沉璧	杨闻宇	110
六骏踪迹	杨闻宇	116
怀疑荆轲	朱 鸿	123
老西安（节选）	贾平凹	149
犁铧，耕耘着宫阙	雷抒雁	178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	181
春风满洛城	郑振铎	185
郑州，殷的故城	郑振铎	192
昭君墓	郑振铎	199
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204
南 京	朱自清	210

文景之治

□ 黄仁宇

汉朝于公元前 202 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

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 23 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 16 年。这 39 年，从公元前 179 年到前 141 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罚，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羨的时期。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在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 1700 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著《威权皇子》（The Prince）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

描写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借。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的典型。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长期如此，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菑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借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又11年之后，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有不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将他下狱致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歌

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残酷少恩。汉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出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差异。

隋炀帝

□ 黄仁宇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 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 608 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610 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以炫耀于西蕃之朝贡者。戏场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

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得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驄驹，一日千里，他就入牝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有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五十一万八千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骛，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裴矩设计破吐谷浑，羁縻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

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做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

615 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 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 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吏。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篡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 7 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 20 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

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时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